

《清国史·儒林传》 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

马延炜 / 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清国史·儒林传》

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

马延炜 / 著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 / 马延炜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561-0647-9

I. ①清… II. ①马…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6802号

QINGGUOSHI RULIN ZHUAN YU QINGDAI XUESHUSHI DE JIANGOU

《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

著 者 马延炜
责任编辑 黎晓慧 刘 芳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647-9
定 价 26.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序

黄爱平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与集大成阶段。有清一代，学者埋首董理群籍，在经学、小学、史学、天文、地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正因为如此，对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分析和评价，自清末民初以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许多知名人物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都对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变化有过系统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逐渐重视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本身发展历程和研究范式的讨论，《清国史·儒林传》《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学案小识》等或官修、或私撰的清代学术史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在这类由清人自己编修的学术史著述中，《清国史·儒林传》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该书出自清朝官方修史机构——国史馆，以为主要学者立传的方式，梳理有清一代的学派谱系，展现有清一代的学人群像。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等由私家撰述的学术史著作相比，该传纂修时间漫长，收录人物众多，既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又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对今人研究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清朝覆亡后，这部由官方修史机构编纂的学者传记曾在较长时间内为学界所忽视，不仅其增删修订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而且其建构的清代学术史体系也少有关注。近些年来，海峡两岸有学者对该传进行了初步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他们或就该传研究清代某位学人的形象

变迁，或以该传的某部稿本作为分析对象，尚非对该传全面、系统的研究，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2004年，马延炜由西北大学推荐免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跟随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考虑到她硕士阶段曾做过与晚清古文《尚书》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基础，我原建议她继续从事清代《尚书》学的研究，但她主动提出要将《清国史·儒林传》的相关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鉴于该传的学术价值和本身的研究空间，我同意了她的设想。经过三年的努力，延炜的博士论文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概括而言，全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资料翔实，考证严密。《清国史·儒林传》的纂修，自乾隆三十年（1765）动议起，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三次续修止，前后历经140余年，其间人事更迭、稿本数易，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延炜从最基本的文本调研和资料考订做起，在对该传现存各种文本进行摸底排比的基础上，认真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国史馆原始档案，广泛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北京地区各家藏书机构的资料，大量翻阅诸多参与编纂者的文集、信函、日记等相关资料，反复比勘，多方考证，潜心研究，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工作，不仅基本复原了该传编修的原始过程，而且大体厘清了各种文本的存世情况，细致分析了彼此之间的因革递变关系。期间她曾以《〈清国史·儒林传〉纂修考》一文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获得与会学者的一致称赞。

其二，思路清晰，结构合理。作为一部首次系统全面研究《清国史·儒林传》及其相关问题的专著，作者首先花大力气考察复原清国史馆历次纂修《儒林传》的全过程，既包括编纂动机、体例内容、增修续纂、文本流传等各个方面，又涉及历次纂修之主编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纂修人员的撰写分工，书稿内容的增删变动等问题，不仅厘清了清国史馆《儒林传》的编纂情形，而且澄清了前贤时哲一些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在文本分析和文献考证基础上，

延炜将《清国史·儒林传》置于清代社会发展和学术变化的长时段内进行考察,分析其与清代汉宋之争以及国史编纂的关系,比较其与相关学术史著作的异同,进而提出深化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思路和建议。全书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反映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其三,论述深入,多有新意。鉴于《清国史·儒林传》的学术史特性,延炜尤为关注其与清代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清国史馆是如何通过编纂《儒林传》来建构起本朝的学术历史的?再如,这部由清国史馆《儒林传》所建构的清代学术史,又如何影响了后人对清学史的认知和建构?带着这些问题意识,作者深入分析了该传编修过程中汉宋不同学术宗尚学者之间的种种意见和争论,考察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学术史书写的影响,并将《清国史·儒林传》与《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史稿·儒林传》加以比较,探讨了该传对后人清学史认知的影响。这些分析和论述都颇具新意,多有创见。特别是作者力图发掘体现在《儒林传》纂修过程之中以及隐藏在其文本书写背后的思想史与文化史,成功地实践了文献考证与学术史、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既拓展了有关《清国史·儒林传》本身的研究,也深化了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探讨,尤为值得肯定。

当然,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清国史·儒林传》的专著,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传前后纂修多次,同一个学术人物往往有几份不同的传文。通过对不同时期传文的比较,可以看出时代变迁、学术风尚的变化,对于后人分析清代学术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于此虽然以颜李学派为例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仍显薄弱。再如,中国传统学术史,除了传记体的“儒林传”外,还有书志体的“艺文志”,清国史馆纂修的《清国史》也同样二者并存。就此而言,《清国史·儒林传》与《清国史·艺文志》之间有何关系,在梳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脉络方面有何功用和特色,也有必要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均有待日后深入研究。

延炜于2009年毕业后,有机会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遂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晚清时期的湖南地方学术史,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近,

她结合近些年的思考，将博士学位论文重加整理，定名为《〈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的建构》，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索序于予。作为导师，在内心深感欣慰的同时，更由衷希望延炜继续努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6 年盛夏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绪论 / 001

一、从经师谱系到儒者列传——《儒林传》的历史变迁 / 001

二、《儒林传》与学术史 / 004

三、清代学术史的编修与《清国史·儒林传》 / 007

四、研究现状述评 / 009

五、本书研究主旨与篇章结构 / 012

第一章 文本形成 / 015

第一节 清代的学术史编修 / 016

第二节 初稿的纂修 / 027

第三节 删改与续纂 / 042

第二章 历次纂修文本之比较 / 055

第一节 现存《清国史·儒林传》的版本情况 / 056

第二节 诸稿之对比 / 066

第三节 传文之递变 / 079

第三章 《清国史·儒林传》的编修与汉宋之争 / 093

第一节 为汉学争正统 / 097

第二节 桐城派的无奈 / 104

第四章 清后期的国史编修与《清国史·儒林传》

——以最高统治者对历史书写的控制为中心 / 115

第一节 清代帝王对于国史编修的影响 / 118

第二节 清后期最高统治者对《清国史·儒林传》编修的影响

——以宣付史馆为中心 / 130

第五章 与其他传记体清代学术史的比较 / 145

第一节 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比较 / 146

第二节 对《清史稿·儒林传》纂修的影响 / 158

余论 《清国史·儒林传》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化 / 191

结论 / 199

参考文献 / 201

后记 / 213

绪 论

一、从经师谱系到儒者列传——《儒林传》的历史变迁

“传”作为一种文体，起源很早，并且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释经之传”和“列传之传”两种。而作为史书中一种记载形式的传，根据今人的研究，“可能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出现，《穆天子传》是最早单行的传，《世本》中的传，是最早与其他史体并行的传，这是可以断言的”^①。虽然司马迁并不是传体的创立者，但是纪传体史书的基本规模和在其中开辟一个专门领域用以记载儒家学者的生平事迹，并名之为“儒林传”，却是自他才开始的。

《史记·儒林列传》的体例设计是围绕着西汉时期被立为王官之学的儒家“六艺”（五经）展开的，主要表现在入传人物皆为某部经书的“博士”，且不以生卒年份序其先后，而依《诗》《书》《礼》《易》《春秋》的经书次序排列，即《史记正义》引姚承语云：“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综理古文，宣明旧艺，咸劝儒者，以成王化者也。”^②这使得《史记·儒林列传》呈现给后人的，是一篇关于西汉时期儒家五经官方传递源流的谱系图，该传也因此被学者认为是“六艺的依附者和保护者”^③。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观察到的：“《史记·儒林列传》是以五经博士为骨干而创立的。”^④

① 周春元. 传体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 [J]. 史学史研究, 1982 (2).

② 儒林列传 [M]// 司马迁. 史记: 卷 121.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③ 张三夕. 六艺的依附者和保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评说 [J]. 海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 (1).

④ 徐复观.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C]//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史记》所建立的以纪、传、表、志为主要内容的史书编纂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史书编纂的一种主要体式。虽然在传统中国的不同阶段，不少历史编纂者都在编辑各自史书的具体过程中，对这一由《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编纂形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损益，但纪、传、表、志的基本框架却一直被沿袭下来。具体到《儒林传》来说，从东汉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在编纂纪传体的本朝史（国史）时，不少都设立了《儒林传》以记录当代儒者生平，^①易代而修的纪传体正史，大部分也设立了《儒林传》或《儒学传》。^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书在接受了《史记》对于《儒林列传》之名称、记载内容等主体设计的同时，也对如何著录该类传的人传人物进行了调整。具体说来，就是从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以书系人，转变为以学者为中心、以学派系人。这一调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纪传体作为中国史书编纂主要形式的地位被西方近代章节体取代之后，宣告结束。

和《史记·儒林列传》最为接近的《汉书·儒林传》，虽开篇即言“古之儒者，博学广六艺之文”^③，但在五经的序列上已改为《易》《书》《诗》《礼》《春秋》，且言及《史记》中不曾言及的《毛诗》和《左氏传》。^④而南朝时成书的《后汉书·儒林传》，则由于东汉博士数量众多，不能如《史记》《汉书》那样悉数登载，开始有所取舍，即“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⑤。东汉覆亡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政治动荡时期，其间虽曾由西晋实现统一，但时间甚为短暂。政局不稳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教不兴，“二十四史”中成于这一时期并反映这一时期相关史事的

① 例如东汉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官修本朝史——《东观汉记》，就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把时代隔越，而行迹近似的人物，归属一篇，并以专题名篇”，其中包括《儒林传》。（仓修良，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15.）

② 二十四史中，除了《三国志》《宋书》《南齐书》等7部外，其余全部设立了《儒林传》。其中，《旧唐书》《新唐书》《元史》则称为“儒学传”，名异而实同。

③ 儒林传[M]//班固.汉书：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C]//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⑤ 儒林列传[M]//范曄.后汉书：卷79.北京：中华书局，1962.

四部著作——《三国志》《宋书》《南齐书》和《魏书》，^① 有三部没有设立《儒林传》，分别是《三国志》《宋书》和《南齐书》，《魏书》虽设立了《儒林传》，但相关篇章已经亡佚，今本乃后人用高氏《小史》所补。^②

公元581年，随着隋文帝统一南北，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时代——隋唐时期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编纂完成了多部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成于这一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时期编修的这些纪传体史书体例较为完备、叙述较为完整，并且都设立了《儒林传》以记叙儒家学者生平。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则改变了《史记》《汉书》儒林传中以儒家经典为中心，通过描述相关学者在各自所研习之经典的传承谱系中的位置来展示当时儒学发展情况的做法，转而开始重视对相关时代学术发展历史以及学人生平、学术主张、学术著述等情况的记叙。例如唐初由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在其卷91《儒林传》中叙述有晋一代儒学史时，就改变了以往史书中以经系人的写法，开始以人为中心，小序云：“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颀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义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纘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为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

① 在这四部史书中，《三国志》成于西晋，《宋书》和《南齐书》成于南朝梁时，《魏书》成于北齐。

②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3）。

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①从这里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以往“儒林传”中所描绘的儒家经典传承谱系的清晰线索，而是一个对当时学术发展情况的总体说明。

隋唐时期学者对《儒林传》之编修格局所进行的这一改造，被后来的史书编纂者们继承了下来，并逐渐进一步以学术宗旨、学术门派确定和划分入传人物。元代编修的《宋史》，从《儒林传》中分出《道学传》，专门记录传承程朱理学的道学家生平。^②清人编修的《明史》，其《儒林传》在叙述有明一代学术时，更是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③

二、《儒林传》与学术史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并连载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著以章节体的形式，勾勒了春秋以前直至清代的学术思想演变史。胡适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④梁启超采用西方近代章节体这一不为当时中国学人所了

① 儒林传 [M]//房玄龄等. 晋书：卷 91. 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道学一 [M]//脱脱等. 宋史：卷 427. 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③ 儒林传 [M]//张廷玉. 明史：卷 28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胡适. 四十自述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6.

解的体裁进行写作,^①虽然讨论的仍是中国旧有学术,但在清末西学全面植入的历史背景下,仍易给人以“新”的观感,仿佛中国旧日并没有“学术史”。

事实上,在西方这种近代章节体的学术史传入之前,中国自身原本也有“学术史”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成熟。但对于《明儒学案》之前,中国有无“学术史”,特别是历代正史中的《儒林》一传是否可视作学术史,学界则有不同看法。梁启超在认定“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②的同时,已注意到旧史中的《儒林传》“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但他强调“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③张舜徽先生则说:“不少的人认为中国有学术史的写作,是从黄宗羲编述《明儒学案》开始的。他在史学界创立了学术史的体例,功不可没。其实,如果考镜源流,探求本始,我国有学术史,自以《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为最早。不过,《史》《汉》《儒林传》所记载的人物,是汉代的传经之士,或者立于学官的博士之学。有些方面较宽、知识领域较广的大儒都有专传,而不列入《儒林传》,何能概一代之全。”^④

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必须与对纪传体史书中《儒林传》产生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的规模之前,曾存在着一些专门记录人物生平的传记,这些传记单独流传,并不作为某部史书的一部分,其中既有记单人的,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高祖传》,也有记行为事迹相似的一类人的,如刘向的《列女传》。这些单行的传记,对纪传体史书中

① 根据夏晓虹先生的研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学界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并已经开始采用西人的史著文体。梁启超是著主要受到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和白河次郎等《支那学术史纲》的影响。(夏晓虹,《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导读[C]//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48.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36.

④ 张舜徽,《清儒学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9-150.

相关传记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后来正史中的《列女传》，就是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影响才出现的。但是《儒林列传》的产生，却是首先见于正史的一部——司马迁《史记》。换句话说，在此之前，并没有一部如刘向《列女传》那样记载一些女子行为的类传在记载儒林学者。所以，和《列女传》等传记尚可单独观之不同的是，《儒林传》自其产生之初，就和正史，特别是纪传体史书中其他的记载门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历史编纂者而言，对于“儒林传”之编修与写作的考量，不可能脱离该部纪传体史书的整体而单独进行，必然是与如何编修该部史书中其他相关记载门类的问题相结合的。并且正是由于无论是司马迁于《史记》中所创立的“儒林传”，还是后世历代史官所编修的正史中沿袭设立的“儒林传”，都只是一部包含了纪、表、志等多种记载门类的纪传体史书中的一个记载门类，一些纪传体史书中才出现了部分大儒单独立传，不入“儒林传”的情况，这是史家在对整部史书通盘考虑后进行的安排，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否定“儒林传”的学术史特性。^①

往昔之事既不可复制，史家的任何分析，都不得不依靠当时人留下的记载，而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中，历代官修的纪传体正史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部分。^②司马迁的《史记》作为第一部系统的纪传体通史，其所创造的纪、表、书、传的记史体裁，经过《汉书》的补充完善后，演变成为纪、表、志、传的记史体裁，并基本被后代史书所沿袭。其中，除了《儒林传》因是学者类传，故颇言学术外，《艺文志》也因登载四部著作，记录一代文献而与学术相关。两相比较，《艺文志》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以对书的分类登录为主。而《儒林传》则以学术研究的主体——人为记录对象，尤其注意网罗那些

① 台湾学者李纪祥曾对“学案”与“儒林传”的学术史特性进行区分，认为“学案”乃是一种别行或单行于正史之外的学术史，而置身于正史之中的学术史，即是“儒林传”。（参见李纪祥，《清史·儒林传》纂修之学术史反思——由《国朝汉学师承记》到《清代学术概论》[C]//彭林. 清代经学与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笔者认为论甚为精当。

② 尽管“二十四史”并不全为官修，但出自官方史馆和私人奉敕编纂者实占其中绝大多数。

未能因“名位既隆”而“自有列传”^①的学者，使得后世得以了解这些“身在草泽”的学者。另外，《儒林传》的写作方式，注意学者的师承授受以及学问流派，并通过设立专传、附传和又附传来表现，何人能够入传，何人宜立专传，何人宜立附传，附传者又宜附于何人之下，体现出纂修者对当时学术风貌的认识和对不同学者的看法，后人阅览及此，亦可管窥古时学术情况之大端。因此，“儒林传”可以说是今人了解与研究相关时代学术史的重要渠道。

三、清代学术史的编修与《清国史·儒林传》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专制王朝，在许多方面都集以往各朝之大成。以学术文化为例，无论是官方大型丛书、类书的编纂，还是学者埋首董理群籍，都将中国传统治学与研究的方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清代学术的探讨并不始于今人，清人自身已作有意识的梳理与论说。嘉庆中叶以后，对“本朝学术”的论说渐成系统。江藩以布衣身份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虽当时即有学者致书商榷，确是对清学史第一次有系统的清理，亦开相关整理之先河，后世学者起而续作，所成著述，亦颇多可观者，^②这些都是从汉学角度对清学进行的勾画。道、咸以后，国家多故，学者转而倡导经世之学，宋学复兴，唐鉴写作《国朝学案小识》，从宋学角度对清学史作了不同的描绘。这些清人自撰的清学史，在为今人研究提供重要资料的同时，其文本本身的研究也已引起研究者相当的重视。但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对这些传记体学术史的研究，还只集中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等著作上，而对同样以传记方式描绘清学史并出自清朝官方修史机构——国史馆的《儒林传》的基本情况，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就在嘉庆十五年（1810）至十六年（1811）间，江藩全力写作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同时，由清朝官方修史机构——国史馆组织编写的

① 儒林传 [M]//房玄龄等.晋书：卷91.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6.

② 关于清人续《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作，参见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40-352.

《国史·儒林传》亦在修纂当中。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著得阮元之力刊刻于广州。而早在嘉庆十七年（1812）就已基本完成初稿的《国史·儒林传》，在通过散出的稿本向外传播外，亦由史馆做进一步的修改，光绪年间更做多次续修。所以，与《汉学师承记》主要描绘嘉庆之前的清学面貌。《学案小识》没有叙述同治以后的清学史不同的是，《国史·儒林传》前后纂辑多次，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了有清一代的学术史，基本网罗了有清一代所有的著名学者，特别是经过多次续修与删改，一些重要的学术人物形成了多份传稿，通过对这些成于不同时期、不同纂修官之手的同一人物传记的比勘，字里行间，不仅可见清人自己对这些为后世所熟知学者看法的变化，也可管窥学术风尚的变化。

《清国史·儒林传》出自清人自身，清人围绕着如何纂修该书，有着非常丰富的讨论，这些编纂过程中的问题，本身也是清代学术史情况的绝佳反映。清人看重“儒林传”，轻视“文苑传”，甚有深恐为文苑传中人者。^①特别是桐城一派，求入“儒林传”而不可得，虽声言“吾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于此一时哉！”^②但言语之间，仍难掩其深厚的无奈感。对这些问题的探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探究《清国史·儒林传》的修撰情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以此为基点，更深入地了解清人及其学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是传既出自官方修史机构，所纂修者又为当代之史，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清朝国史馆，向有缮写史传正本进呈御览的做法。乾隆一朝，皇帝以九五之尊，亲自充当“历史判官”，^③经常对国史中人物传记的书写作出指示。嘉庆以后，国力式微，最高统治者虽较少对具体传文的写作

① 据说姜宸英自少年起就“常恐为文苑传中人”（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5。）

② 姚鼐：《姚惜抱先生尺牍》：卷八[M]，陈用光，编，重刊本，上海：小万柳堂，1909（清宣统元年）。

③ 何冠彪：《乾隆皇帝的“历史判官”形象》[C]//《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